DOI:10.20270/j.cnki.1674-117X.2026.5010

回顾与展望：中国关于《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研究述评

李瑞宁

（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1）

摘要：《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是系统阐述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经典著作。国内相关研究起步于 20 世纪 60 年代，经历了从零星起步到缓慢发展、再到快速增长的过程。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研究成果显著增多，出现多个研究热潮。经过六十余年的积累，学界在著作思想、版本探考、价值阐释与传播梳理等维度上已形成较为系统的研究成果。与此同时，相关研究尚有不足之处，未来研究应注重提升问题意识、深化研究分歧的辨析、加强史料发掘与实证分析，并着重探讨《发展》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独特贡献，进一步推动相关研究的拓展与深化。

关键词：《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科学社会主义；唯物史观；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117X(2026)05-0084-08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以下简称《发展》）是系统阐述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经典著作。这部著作由恩格斯于 1880 年根据《反杜林论》的部分内容改编而成，具体包括《引论》第一章、第三编第一章和第二章。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入门”书籍，《发展》开创了马克思主义通俗化和大众化的历史先河。这部篇幅简短的小册子一经问世便迅速传播，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有力武器。

国内关于《发展》的研究起步于 20 世纪 60 年代。根据中国知网期刊数据库的检索数据（检索时间为 2025 年 12 月 12 日），1963 年至 2025 年间，以“《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为关键词检索到的学术文章共计 160 余篇。六十余年来，国内学界已出版以《发展》为研究对象的专著十余部，相关论文数量呈逐年上升态势。从时间分布来看，该领域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1963 年至 1991 年为萌芽起步阶段，研究成果零星出现；1991 年至 2012 年为缓慢发展阶段，研究视角逐步拓展；2012 年以后进入快速增长阶段，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研究成果显著增多，出现了多个研究热潮，学科覆盖面从哲学、政治学扩展至经济学、教育学等领域。

梳理学界的相关研究，对于把握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研究动态、深化对《发展》的理论认识、发掘其回应现实问题的当代价值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基于此，有几个核心问题需要追问：国内学界对《发展》的研究经历了怎样的学术演进？已有成果在哪些问题上形成了共识，在哪些问题上存在分歧？这些研究存在怎样的局限？未来研究可以从哪些方向寻求突破？围绕上述问题，本文将从著作思想、版本探考、著作价值与传播历程四个维度展开论述，在系统回顾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分析其贡献与不足，进而展望未

收稿日期：2026-03-01

作者简介：李瑞宁，女，宁夏吴忠人，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

来可能的研究方向。

一、《发展》的著作思想研究

关于《发展》的著作思想研究，成果最为集中。学界主要围绕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理论、现代经济思想的当代阐释三个维度展开。

（一）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发展》的核心主题是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它集中阐释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转变逻辑。围绕这一主题，学界从历史生成、概念价值、性质特征、体系结构等方面进行了系统解读。

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生成，学界将其置于社会主义思想史的演进脉络中加以考察。既有研究的基本判断是空想社会主义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源头存在内在缺陷，其诉诸理性和道德批判，却未能揭示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其构想未来社会的蓝图，却未能找到实现这一蓝图的现实力量。科学社会主义之所以超越空想社会主义，关键在于实现了两个根本转变。其一是理论基础的转变，即从唯心史观转向唯物史观；其二是实践路径的转变，即从道德感化与阶级调和转向依靠无产阶级革命[1]。由此看来，《发展》正是呈现这一超越过程的经典文本。从对空想社会主义的系统批判，到唯物史观的引入，再到生产力社会本性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间矛盾的揭示，其在三个递进的论域中完成了对科学社会主义生成逻辑的严密论证[2]。

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概念价值，研究焦点集中在“科学社会主义”这一概念本身的理论意义。恩格斯写作《发展》的直接目的是为法国工人提供一部系统而通俗的社会主义理论读本。在这一通俗化过程中，他实际上完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系统概括，详细阐发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主旨要义、衡量标准及未来理想社会的基本特征[3]。“科学社会主义”这一概念对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具有内在的贯通作用，其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学说三个组成部分在“科学性”这一基点上实现了统一，使理论经由哲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而最终以“人类解放学”的整体面貌呈现[4]。

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性质特征，学界的概括呈现多维视角。“整体性”是最早受到关注的特征，有研究将整体性理解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部分之间的内在联系，认为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的理论基础正是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5]。也有研究将其理解为理论、运动、制度、目标四个层次的有机整体，认为只有在这四者的统一中才能把握科学社会主义的完整内涵[6]。此外，“科学性”[7]、“价值合理性”[8]、兼具“道德可欲性”与“历史必然性”[9]等特征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关注。

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体系结构，学界进一步区分了广义与狭义两个层面。广义上，科学社会主义的内涵延展至整个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群，形成以“两大理论基石”（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理论）、“两个必然”（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两个决不会”和“一个科学预测”为基本框架的思想体系[10]。狭义上，这一体系则围绕《发展》本身构成一个闭环的逻辑链条，其中空想社会主义的批判、唯物史观的引入、剩余价值理论的揭示三者环环相扣，共同构成科学社会主义创立的思想渊源与理论基础[11]。

综观上述研究，学界对《发展》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阐释已形成较为完整的框架，在历史脉络、概念内涵、性质特征和体系结构等方面均取得了重要进展。但也应看到，多数研究采用从著作出发还原恩格斯思想脉络、进而论证其“科学性”的基本路径。这一路径的优势在于忠实于文本，但也存在有待突破的空间。研究者较少追问恩格斯的阐释与马克思的原始论述之间是否存在张力。当恩格斯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概括为“两大发现”时，这种结论式呈现可能弱化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等原典中更为复杂的论证过程。此外，对“整体性”的强调虽然正确，但理论、运动、制度、目标等不同层次之间的逻辑关系及其历史演变尚缺乏足够深入的分析。总体而言，现有研究倾向于以结论式呈现替代对论证过

程的深入考察，这在一定程度上简化了恩格斯思想的复杂性和内在张力。

（二）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理论研究

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理论被恩格斯称为马克思的两个“伟大的发现”，也是《发展》据以论证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石。学界围绕这两大理论基石在《发展》中的呈现方式、功能定位及其方法论意义，形成了较为集中的研究成果。

就唯物史观在《发展》中的呈现而言，恩格斯在这部篇幅不大的著作中深化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他追溯了决定唯物史观形成的历史事实，提出并完善了“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概念，为这一理论提供了明确的命名和系统的阐述[12]。落实到具体论述中，《发展》对唯物史观的运用主要体现在对现代社会主义的界定上。恩格斯从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对立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的考察出发，揭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基本原则，进而推导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4]。

关于剩余价值理论的功能定位，学界将其与唯物史观并置，视为科学社会主义的两大理论支柱。有研究概括了二者与科学社会主义主题之间的逻辑关系：唯物史观揭示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剩余价值理论揭示资本主义社会运动的特殊规律。前者提供方法论基础，后者提供实证分析。二者相互支撑、相互印证，共同论证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13]。由此可见，剩余价值理论不仅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学分析，更回应了“社会主义何以是科学的”这一根本问题，因为它揭示了资本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胜利的客观经济条件。

上述研究对两大理论基石的功能定位已形成基本共识，但其论述方式带有结论先行倾向。研究者往往直接阐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使社会主义变成科学”，却较少追问恩格斯在《发展》中如何论证这两个发现；这种论证方式与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资本论》等原典中的论证存在怎样的异同；对于非专业读者而言，这种高度凝练的阐释是否弱化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复杂内涵。这些问题关涉对“科学性”本身的理解，但在现有研究中尚未得到充分回应。

（三）现代经济思想研究

《发展》虽然以科学社会主义为主题，但也蕴含着丰富的经济思想。近年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深化，学界开始从现代经济视角重新解读《发展》的理论资源。已有研究主要从生产力、生产方式与共同富裕等角度展开。

关于生产力思想，《发展》揭示了科学社会主义与生产力发展之间的内在关联。社会主义不是单纯的价值诉求或道德理想，而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这一判断对于理解生产力发展与社会主义胜利之间的因果关系具有重要意义[14]。

关于生产方式思想，有研究从历时性与共时性两个层面梳理了《发展》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发展及灭亡特征的阐述。在历史演变层面，恩格斯追溯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萌芽到成熟，再到面临危机的历史过程；在结构分析层面，他揭示了这一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根本冲突，由此呈现了《发展》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基本路径[15]。

共同富裕思想近年来已成为现代经济思想研究中关注度较高的议题。有研究指出，《发展》虽未直接使用“共同富裕”这一概念，却蕴藏着丰富的思想资源，既包含对资本主义两极分化的批判，也涉及生产力高度发展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统一、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无产阶级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等内容。在这一意义上，《发展》对于理解和运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价值[16]。

上述研究体现了理论阐释与现实关怀相结合的研究自觉，但也应看到，目前的相关成果多为初步阐发，尚未形成系统的理论框架。值得追问的是，“共同富裕”在《发展》中并非显性主题，研究者如何从著作中合理地引申出这一思想，其依据和边界在哪里？如果对这一方法论前提缺乏自觉反思，则可能陷入以经典文本简单比附现实实践的论述方式。如何在文本的忠实解读与当代意义的创造性转化之间保持平

衡是这一领域未来研究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二、《发展》的版本探考研究

《发展》的版本探考研究是现有成果中相对薄弱的领域，主要集中在通俗版本考证与珍贵版本探考两部分。

（一）通俗版本考证

《发展》区别于众多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一个显著特征是通俗易懂性。一部论战性大部头著作被改写为一本篇幅简短、广为流传的小册子，其间的取舍与转换本身便值得关注。

对《发展》通俗版本的考证最早可追溯至原民主德国学者雷纳特·梅尔克耳的研究。他揭示了一个关键的历史细节，恩格斯改编《反杜林论》并出版《发展》法文版，直接动因并非出于通俗化考量，而是应保尔·拉法格的请求。当时法国《社会主义评论》杂志的编辑贝努瓦·马隆要求拉法格向法国社会主义者普及德国的社会主义思想，拉法格转而求助于恩格斯[17]。《发展》的“通俗性”从一开始便带有明确的实践指向。

20世纪90年代，国内学界就《发展》的“通俗性”问题展开了一场重要论争。争论的焦点在于如何理解恩格斯对《反杜林论》的“改编”：是面向大众的通俗化处理，还是理论上的精炼与深化。通过比对德文初版与第四版的28处修订可以发现，这些改动旨在使理论表述更为精准、完整与深刻，而非仅仅降低阅读门槛。据此，魏鸿彬质疑“通俗入门读物”的定位，主张《发展》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最为成熟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著作[17]。这一观点引发了不同意见，通过梳理编辑要求、作者解释和读者反映三方面材料，特别是《社会主义评论》编辑贝努瓦·马隆及《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爱德华·伯恩斯坦同恩格斯的往来书信，杨玲翔实论证了《发展》的通俗性，认为通俗性不仅不贬低著作的实际价值，“反而使其广为流传，读者众多，价值倍增”[18]。这场论争以后者获得更广泛的认同而收束，但前者提出的“通俗化是否必然导致理论简化”这一问题，仍有待进一步探讨。

（二）珍贵版本探考

不同语种版本的梳理、比对与考证，是深化《发展》研究的重要前提。自问世以来，《发展》先后被译成多种语言，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流传，然而目前学界在这方面的成果尚不充分。

就学术论文而言，仅有一篇专门研究1949年以前版本的论文，其梳理了法、德、英、日、荷兰语、中文六个语种版本在出版源流、发行形式和主要内容上的差异[19]。就学术专著而言，有研究者考察了读本五个语种版本的出版与传播情况[20]，另有研究者分别对吴黎平译本和林超真译本进行了版本考究[21-22]。

版本探考是著作研究的基础环节，但目前国内相关研究的覆盖面仍然有限。相较于《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著作的版本研究，《发展》在这方面有待系统推进。不同语种版本之间的差异可能隐含重要的思想史信息。例如，恩格斯在不同语言的版本中是否有意调整了表述，这些调整反映了怎样的理论考量或传播策略等，迄今未得到充分关注。这一领域的拓展，既需要精通多门语言的研究者投入专门精力，也需要学界对版本考证给予更多重视。

三、《发展》的著作价值研究

《发展》的著作价值研究主要从理论价值与实践价值两个维度展开，侧重于考察该著作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思想贡献，同时关注其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启示意义。

（一）理论价值研究

理论价值研究聚焦于《发展》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内部的功能定位，主要从其对科学社会主义理

论史的贡献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意义两个层面展开。

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史上的贡献方面，学界普遍将《发展》定位为恩格斯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阶段具有标志性意义的著作。科学社会主义的形成经历了从孕育、正式形成到走向成熟、最终确立理论体系的渐进过程，《发展》正是在这一过程中的重要节点上写就的奠基之作[23]。其有力回驳了杜林主义的理论挑战，以清晰的理论逻辑和通俗的表达方式，系统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24]。从思想史视角来看，恩格斯通过《发展》建立了一个经过科学论证的、区别于其他社会主义流派的无产阶级思想体系[25]。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意义是近年来理论价值研究的重点方向。有研究从启蒙思想史的角度切入，指出《发展》深刻阐释了空想社会主义与资产阶级启蒙运动之间的继承与超越关系，认为科学社会主义并非简单地“反启蒙”，而是对启蒙的深化与超越。这一判断对于在新时代语境中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定位具有参照意义[26]。另有研究强调《发展》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础性指导作用”，认为其所蕴含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从现实生产力中寻找出路的方法论原则，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唯物史观的理论根基[27]。上述研究从不同层面揭示了《发展》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间的内在关联，但其分析更多停留于宏观层面的对应，对恩格斯的原初论述如何在具体历史语境中被转化和运用尚缺少深入考察。

理论价值研究是《发展》研究中最具共识的领域，但这种共识也带来了一定的局限。多数研究沿袭“两大发现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这一经典论断，较少提出新的问题或挑战既有解释，形成了一种相对固定的论述模式。然而，这种高度同质化的论述是否忽略了恩格斯思想中更具理论张力的面向，值得进一步审视。例如，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性”是否意味着对“价值性”的弱化；在《发展》的论述中历史规律与革命实践之间是否存在尚未充分化解的张力。这些问题在《发展》中存在复杂的文本呈现，但现有研究鲜少涉及。反思这种“标准化叙事”是理论价值研究寻求突破的一个重要方向。

（二）实践价值研究

《发展》的实践价值研究主要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思想政治教育两个维度展开。

就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而言，研究普遍从著作源头、篇幅、内容、形式等方面加以分析。作为《发展》的文本源头，《反杜林论》第一次以体系化和通俗化的方式阐释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则进一步通过各种语言的译本，使全世界的工人阶级能够系统认识马克思主义[28]。从更深层看，这与恩格斯晚年著作的语言风格密切相关。他在学理性与大众性之间取得了良好的平衡，以尽可能平实的笔触还原马克思的核心思想，既满足了广大群众的阅读需求，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有效传播[29]。《发展》之所以能在工人运动中广泛传播，一个重要原因是工人阶级能够理解和接受它所阐释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这一事实表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应当走大众化道路，在形式和风格上贴近人民群众[10]。有研究进一步从形式、内容、方法三个维度概括了《发展》的大众化特征：篇幅精悍、版本全面、语言生动促进了形式大众化；删减合宜、补充适时、修改严谨促成了内容大众化；显性阐述与隐性阐述相结合推动了方法大众化[30]。

就思想政治教育而言，研究主要从理想信念教育和教育方法论两个切口展开。《发展》评述了三大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得失，指出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论证了共产主义社会的历史必然性。就此而言，当前开展理想信念教育需要在全面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深刻理解其科学内涵，用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方法认识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必然性，同时正确看待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辩证关系[31]。《发展》的出版和发行在历史上取得的巨大成功则进一步表明，人民群众有接受社会主义宣传教育的真实需要，开展思想政治教育需要注重理清思想理论的总体思路，并采用通俗的理论载体以取得良好的教育效果[32]。

实践价值研究具有较强的现实关怀，但多数成果停留于从经典中抽取若干原则并直接投射到当代实践的论述方式。这种研究路径虽预设了经典与现实之间的线性关联，却忽略了二者之间的历史中介和理论转换环节。然而，《发展》的通俗化成功是否以理论简化为代价，如论证省略、多维思想的线性化呈现，

理论简化是否不可避免，回答这些问题是实践价值研究深化的前提。

四、《发展》的传播历程研究

关于《发展》的传播历程，学界主要聚焦于该著作在中国的传播，时间范围集中在1912年至1949年间。传播研究的趋势表现为从整体梳理逐步走向分时段的专题考察。

（一）传播历程的系统梳理

国内最早对《发展》传播问题进行梳理的学者是张允侯，他于1963年发表的文章考察了该著作在中国的翻译、编辑、出版与传播的总体历程[33]。1912年，《发展》的最早译文发表于中国社会党绍兴支部的刊物《新世界》，但因翻译者理论素养欠缺，译文存在较多错误。1920年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传播开始走向正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查禁马克思主义著作，为应对审查，书名曾改译为《社会主义发展史纲》，作者译名由“恩格斯”改为“因倪斯”。抗日战争时期，出版中心转移至延安，大规模系统翻译出版的条件趋于成熟。1938年至1942年间，“解放社”以《马恩丛书》形式出版了包括《发展》在内的十种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重要著作。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中共中央将《发展》列为“干部必读”的十二种马克思主义经典之一。

（二）传播历程的分段专题研究

在整体梳理的基础上，后续研究进一步聚焦于特定时段或特定问题，形成了若干专题方向。

早期译介方面，有研究考察了《发展》第一个中文译介文本《理想社会主义与实行社会主义》的翻译背景与思想取向，发现译者并非纯粹的理论介绍者，其只是借翻译传达自身的政治主张。译者基于小资产阶级立场对原文进行了改造，其译本呈现的是扭曲的、镜像化的社会主义，即译者理想中的“中人社会主义”。这说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从一开始就并非简单的套用，而是传播主体结合中国实际的自觉尝试，尽管这一次尝试最终被历史证明是失败的[34]。

延安时期的研究侧重传播与革命实践之间的互动关系。《发展》在这一时期广泛传播，其在普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同时，澄清了当时盛行的“一次革命论”等错误认识，批判了党内主观主义和经验主义，反驳了“亡国论”与“速胜论”等片面判断，促进了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形成和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建党，也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的中国化进程[35]。

关于1912年至1949年的整体传播进程，有研究将这一时期划分为三个阶段：零星译介的初级阶段、出版传播的高潮阶段和求质规范的确证阶段。这一分期揭示了传播与时代环境之间的密切关联。每一次传播形态的变化都与政治环境、出版条件、社会需求等因素的变化密切相关。《发展》在这一时期的传播更加完整地呈现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传播的面貌，也澄清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内涵[36]。

传播历程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历史事实和清晰的阶段划分，但目前的研究多为事件史叙述，即关注何时、何地、由谁传播，对传播的社会机制、受众接受、阅读反应等深层问题则关注不足。例如，《发展》在不同时期被哪些社会群体阅读，阅读后产生了怎样的实际影响，是否存在超出传播者预期的误读或创造性转化。这些问题触及思想传播的本质，即传播不只是信息的线性传递，更是文本意义在具体语境中被重新生产的过程，这一层面的微观实证研究尚有待推进。

五、总结与展望

经过六十余年的积累，国内关于《发展》的研究在著作思想、版本探考、价值阐释和传播梳理四个维度上均取得了重要进展，已形成较为完整的阐释框架，拓展了版本考证的学术空间，兼顾了理论溯源与现实关怀，并在史料发掘与阶段划分上积累了较为扎实的基础。与此同时，现有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亟待在未来的研究中予以克服，并在此基础上深化和拓展对《发展》的研究。

（一）当前研究的主要局限

问题意识的同质化。尽管已有研究涉及多个维度，但贯穿其中的问题意识较为趋同。“恩格斯说了什么、为什么它是科学的、它对当代有何启示”这一模式在多数研究中反复出现。这种模式基本回应了《发展》作为“科学社会主义入门”的文本定位，但也使研究长期停留于对恩格斯观点的阐释与论证，较少深入触及文本本身的理论张力与解释困境。

批判性分析相对薄弱。当研究者遵循相近的解释框架时，学术对话便难以充分展开。现有研究中，不同观点之间的分歧较少得到认真评析，对“两大发现”使社会主义成为科学这一主流阐释框架提出不同解读的研究也不多见。学术述评中的“评”在很大程度上为“述”所覆盖。这种状况既限制了研究的纵深推进，也使该领域难以形成真正的学术对话。

方法论自觉的不足。文本研究面临一个基础性的方法论问题，即从一部写于一百四十多年前的经典著作中引申出当代意义时，需要在“返本”与“开新”之间保持平衡。这些关于文本阐释本身的前提性问题在现有研究中很少被明确讨论。方法论反思的缺失使不少研究在经典与现实之间相互印证而未能实现实质性的理论推进。

微观实证研究的薄弱。版本考证、阅读史、接受史、传播受众等领域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这使得宏观的理论论述缺乏坚实的经验基础。对版本差异的精细比对有助于判断恩格斯在不同语境中的思想变化；对读者接受的实证考察有助于评估《发展》的实际影响力。宏观与微观之间的连接尚不充分，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该领域的深化。

（二）未来研究的拓展方向

推动《发展》研究的深化需要从文本复述转向问题导向。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性”究竟是何种意义上的“科学”，其与实证主义、自然科学的关系如何；恩格斯在《发展》中对空想社会主义的批判是否公允；重估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的思想是否有助于揭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建构中未能充分呈现的某些维度；恩格斯对“科学”与“价值”关系的处理是否存在内在张力等。与此同时，应就《发展》研究中的关键分歧展开深入辨析，揭示不同解释路径各自的理论贡献与限度，以及有待解决的核心难题。

深化方法论反思，探索文本阐释的新路径。《发展》最显著的特征在于其通俗性。通俗化是否必然带来理论简化甚至弱化理论的复杂性，理论传播与理论深化之间是否存在一种良性循环而非非此即彼的选择，这些问题的回答将直接影响对《发展》理论价值的评估。回应这些问题需要将文本阐释学、传播学、接受美学等学科的方法论资源引入《发展》研究，而不应局限于传统的“文本、原理、应用”的阐释模式。

推进微观实证研究，厚植学术基础。版本考证、阅读史、受众接受等领域的史料发掘和实证分析可以为宏观论断提供更为坚实的经验支撑。只有在充分掌握史料的前提下，宏观论断才具有真正的说服力。跨语种版本比较研究尤其值得关注，恩格斯在不同语言版本中是否以及如何调整表述，其中可能蕴含着理解恩格斯思想发展的重要线索。

立足中国语境，强化现实关照的理论深度。研究《发展》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独特贡献，不应停留于原理应用的表层描述。中国学者在不同历史时期解读《发展》时，如何结合中国实际进行了创造性转化；这种转化在理论上是否自洽，在实践上是否有效；有哪些经验教训值得总结。对这类问题的深入回答有助于推动经典研究更好地回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课题。

归结而言，《发展》研究的深化既取决于研究方法的更新与文献资料的拓展，也取决于研究者能否以更具问题意识、更具批判精神和更富理论想象力的方式去面对这部经典著作。就此而言，反思既有的研究传统是推动该领域进一步深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参考文献：

[1] 白秉镯，郎廷建 . 恩格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元思考：基于《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文本考察 [J]. 马克思主

义哲学研究，2020(2)：163−170.
[2] 魏泳安，王学俭 . 恩格斯关于科学社会主义历史生成的三个论域：基于《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文本考察 [J]. 学术论坛，2015，38(1)：1−4，17.
[3] 辛向阳 . 恩格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贡献 [J]. 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10)：75−86，168.
[4] 刘占虎 . 守正与拓新：恩格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独特贡献 [J].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1)：15−26.
[5] 王巍 . 恩格斯与马克思主义整体性：以《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为例 [J]. 党政研究，2020(3)：26−32.
[6] 曹玉文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导读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7] 杨哲 . 如何实现和坚持社会主义的“科学性”：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方法论启示 [J].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0，6(4)：22−30.
[8] 张瑞军 . 论社会主义的价值合理性：从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说起 [J]. 理论月刊，2015(3)：11-15.
[9] 岑泽远 . 恩格斯论社会主义的“道德可欲性”和“历史必然性”：基于《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J]. 中共伊犁州委党校学报，2023(2)：10−13.
[10] 赵智奎 . 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及其当代启示 [J]. 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1)：38-45.
[11] 牛先锋，张逊 . 把社会主义置于现实基础之上：读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J].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0，24(2)：25−34.
[12] 吴雄丞 . 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经典：恩格斯著《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研读笔记 [J]. 高校理论战线，2006(4)：22−29.
[13] 梅荣政 . 唯物史观、剩余价值理论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读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节选二、三部分）[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3(2)：54−62.
[14] 刘仁学 . 生产力的发展与社会主义的胜利：读《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的体会 [J]. 吉林师大学报，1979(2)：37-40.
[15] 陈黛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的生产方式思想研究 [D].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22.
[16] 戴明新，方世南 .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共同富裕意蕴 [J]. 学术探索，2023(5)：22−28.
[17] 魏鸿彬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是恩格斯改写的一部通俗的著作吗 ?[J]. 理论探讨，1991(6)：91−92.
[18] 杨玲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通俗著作考：兼与魏鸿彬同志商榷 [J]. 理论探讨，1992(02)：72−75.
[19] 许萌，郭小丽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珍贵版本探考 [J]. 国外理论动态，2022(5)：14-19.
[20] 薛俊强 .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研究读本 [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
[21] 李楠明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吴黎平译本考 [M].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9.
[22] 李楠明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林超真译本考 [M].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20.
[23] 赵曜 . 科学社会主义的奠基之作：纪念恩格斯的著作《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发表 120 周年 [J]. 科学社会主义，2000(5)：9−14.
[24] 蔡亚志 . 系统阐述科学社会主义的名篇：读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J]. 党建研究，2011(11)：56.
[25] 于凤梧 . 坚持科学社会主义：读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0(5)：1−9.
[26] 马拥军，田甜 . 后启蒙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新启蒙：基于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视角 [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1(6)：1−11.
[27] 罗建文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逻辑：基于《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思考 [J]. 湖湘论坛，2021，34(1)：5−16.
[28] 杨柠聪，白平浩 .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典范：《反杜林论》[J].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9(1)：39−47.
[29] 刘同舫 . 恩格斯思想的历史地位与伟大贡献 [J].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4)：1−6，169.
[30] 杭州 .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典范：《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纪念恩格斯诞辰 200 周年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发表 140 周年 [J]. 延边党校学报，2020，36(1)：26−30.
[31] 刘斐莹 .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对理想信念教育的启示 [J]. 学术探索，2021(2)：123−129.
[32] 吴倩 .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 [J]. 教学与研究，2016(6)：66-70.
[33] 张允侯 . 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出版和传播 [J]. 历史教学，1963(7)：31−36.
[34] 汪越，孙熙国 .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思想取向和镜像表达：基于对《理想社会主义与实行社会主义》的文本考察 [J].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0，24(5)：84−93.
[35] 钟佩君 . 延安时期恩格斯经典著作的传播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 [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6(5)：61−64.
[36] 刘暖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在中国的出版与传播（1912—1949）[J]. 理论界，2022(7)：8−15.

（下转第 119 页）